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六九期 ——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2b)

【本刊专稿】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	舒 云
【本刊专稿】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舒 云
【历史一页】东湖风云录(之二)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

• 舒 云 •

1980年审判“两案”，罗列起诉书的罪行时，总参作战部认为“一号命令”和“北兵南调”不是阴谋，坚决顶住。广州军区没有人知道“另立中央”，也坚决顶住。如果这三条罪名成立，总参和广州军区成百上千的干部将被株连。经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反复查证，认为证据不足，在“两案”起诉书中取掉了这三条罪行。

◇ 究竟有没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在九一三事件众多当事人的笔供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基本上搞清楚了，中共中央文件连发了三批材料。其中第三批材料中，有从外逃未遂的直升机上截获的南逃广州的“名单”。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企图在杭州、上海暗杀毛泽东的“第一方案”破产，马上启动南逃广州的“第二方案”。当晚9点多，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召开会议，研究去广州的行动计划和“名单”。因周恩来查问到北戴河的三叉戟，会议中途夭折，所谈的内容全部作废，手写的25人的“名单”也被撕碎冲进马桶。却没想到于新野口袋里还有一份“名单”。外逃的直升机迫降在北京郊区，于新野和周宇驰自杀了，但他们身上的“名单”和去广州

的三架主机的起飞时间表，均被截获。

1971年9月24日，空军党办副主任刘世英亲笔供词：1971年9月9日凌晨1点左右，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向我、刘沛丰、程洪珍和李伟信讲，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接着，他就拿出林彪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的密令，给我们传阅以后，他又讲，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五七一”一程，即“武装起义”。9月12日晚9点多钟，王飞和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又召集我、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人，参加了关于组织政变人员随林彪去广州阴谋另立中央的黑会。王飞向我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13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在这次“黑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我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我记得有23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连，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江腾蛟供认，1971年9月12日晚上，谋杀毛主席的计划失败后，周宇驰召集他和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学院开会，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周宇驰讲，明早8点，林彪从北戴河飞往广州，6点你和王飞、于新野先到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说林彪找他有事，黄来后再通知吴李邱来，让他们上飞机，一起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林彪首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发表广播，争取外援。

1971年10月11日，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供词：1971年9月12日下午6点多，周宇驰告诉我，明日有一架大飞机去上海，另外还有两架大飞机直飞广州，一架林彪他们坐，另一架黄吴李邱和其他人坐。你们乘依尔—18去上海，到了上海再去广州，设法“请”飞机上80至90个穿黄裤子的警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教导队等人一起去广州。周宇驰要我把依尔—18这架飞机要去上海的情况，通知上海小组蒋国璋，并要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还叫过全准备粮票和钱。要他们一定要保密，这是全局的事。周宇驰后来还补充了一句，叫蒋国璋再转告王维国一句话，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以上这些事，我于1971年9月12日简要记录在我的小红皮日记本上。

1971年10月4日，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供词：1971年9月9日晚7、8点钟，反革命分子吴法宪给我打电话说，叶（群）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一定要好好检查，另外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9月10日晚11点以后，反革命分子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我说，谈的很好，叶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吴法宪）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叶还说，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9月12日下午4点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13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宇驰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戟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13日7点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座三叉戟，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点直飞广州，由王（飞）副参谋长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

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按胡萍的指示申请了飞机的航线。

9月12日晚上10点多，林豆豆向中央警卫团报告，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逃跑。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后，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查封飞机。二是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四届人大政

府报告讨论的黄永胜等政治局委员谁也不许动，不许接电话，外面的人也不许进去，周恩来特意叫门外加上警卫。三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查问北戴河的三叉戟，并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周恩来不要来。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叶群想问问黄永胜，但黄永胜找不到了，家里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看样子黄永胜已经被抓。叶群终于慌了，和林立果从床上拉起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说有人来抓你了，快走。南下广州的“第二方案”就这样放弃了，他们选择了“第三方案”，北上。

◇ 张春桥逼卜占亚作伪证

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虽然未遂，但北京这边有一大帮人策划，广州那边呢？不可能干干净净。既然有“中央”就会有“指挥部”，广州肯定会有一套班子。这是一个“大金娃娃”。可是，广州军方怎么没人承认迎接“南逃广州”的飞机呢？就是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也只承认向周宇驰通报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

九一三事件前成立招待处，以后又撤，很可疑，有可能是迎接“南逃”。

或许是几个服务员的告状吧，张春桥之流决定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作为突破口。在长沙“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的卜占亚被弄到北京，经张春桥等人逼供20多天，他的“顽固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卜占亚编造了参与“另立中央”的伪证，承认9月12日零点在长沙接到林彪“南逃广州”的通知。张春桥逼问，谁打的电话？卜占亚硬着头皮也编不下去了。张春桥拿出一个本子，给卜占亚念黄永胜办公室的秘书名单，卜占亚不认识他们。张春桥又念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名单，念到宋诚，卜占亚认识，宋诚原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的处长。他小声说好像是他，华国锋亲自到秦城提审倒霉的宋诚，审了两天两夜。张春桥还不放过，又问卜占亚用什么电话打的？卜占亚说用普通电话。能用普通电话？李先念说，我们会核查电话登记的。其实一查就真相大白，哪里有什么“另立中央”的电话！

197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12号，认定卜占亚上了“贼船”。中共中央文件还专门发了卜占亚检讨的附件。卜占亚立了“大功”，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副政委，六年后改任顾问，1980年1月免职。1982年12月，中纪委关于卜占亚复查情况的通知，认为卜占亚在湖南工作期间有错误，但不是参与阴谋活动，取消中发[1973]12号中共中央文件。

以后卜占亚愧疚地对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刘如说，我当时那样交代是迫不得已，是在别人写好的材料上签的字，我连看都没看。

◇ 刘如说，首长，你“揭发”了，解放了，我们呢？

卜占亚突破了，虽然他挂着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名，但实际上他是在湖南省。广州军区本身还一无所获。

刘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被卷进九一三事件中。他坚决不承认“另立中央”，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就是以“组织”的名义，也坚决不承认。没有就是没有，他顽强地申诉，讲明真相，写一次不行，再写，一遍一遍。

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刘如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汪东兴指示，在广州为毛泽东盖房子

刘如，1927年6月23日生，2003年4月12日去世，76岁的生日都没有赶上。

认识刘如的人都认为他英俊潇洒，充满活力，一个标准的军事干部。他13岁参军，小学文化，从测绘员、作战参谋，一路干上来，官途坦荡。20岁，五师作战科副科长；21岁，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作战科长；22岁，四野司令部作战处参谋；24岁，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29岁，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33岁，作战处副处长；35岁，作战部副部长；38岁，作战部部长；1969年11月，42岁，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打下大半个中国，作战部门功不可没。刘如作为作战部门的一员，表现杰出。在东北战场上，一面大墙，挂50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标满红蓝小旗。第一次解放四平，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秋季攻势，辽沈战役，他都积极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从战场实际出发，及时提出作战建议，并具体组织实施。追歼白崇禧集团时，各师都以最快速度向前推进，有的部队搞不清自己进到哪了，发电问总部，马上告诉你现在的位置，面前敌人的番号，兵力，左邻右舍是谁。刘如还参与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指挥。新中国成立后，四野由中南军区改为广州军区。刘如一直在作战部门，参与歼灭台湾从海上空中派遣18股3000名多特务。提升为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后，他负责军区作战计划与战场建设纲要的拟制，并组织国防施工勘察和检查验收。

1971年4月13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江副司令员叫刘如给总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打电话，大意是根据汪东兴同志指示，要在广州为毛主席盖房子，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保密性高，急需部队进场施工准备，希望总部批准调动。阎仲川说，可以调动。

1979年1月15日，刘如在申诉材料中写道，1971年4月，为在广州给毛主席把房子盖好，吸收武汉、杭州房子的优点，我根据江副司令的指示，率领参观小组4月15日至18日到武汉和杭州参观。我们认为武汉接待工作和警卫工作合一的办法较好，基本上仿效他们的编制，经过多次研究，才提出我们的编制草案。按照丁盛、刘兴元的指示，把省委的小岛和从化两个招待所也列入，几个警卫连、炮排改为高机排，这样就增加了总编制人数，由初稿的800多人增到1300多人，主要是增加了两个警卫连。3月26日原则通过，但我没有建议向军委报告。

1971年6月，为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盖房子，广州军区在南湖动工。因广从公路距离南湖太近，来往的车辆多，噪音太大，对首长进出的安全也不利。我和当时施工办的同志共同研究，提出改线的意见。新建线路十多公里，地形较平坦，只是中途有座山，我建议打隧道（300多米）。为了照顾交通发展和有利于战备，我建议把路改修得完整一些，直一些，平一些，隧道打宽一些，这样战时可作我区飞机迫降用，对交通发展也有利。我的意见报告丁、刘、江、孙。他们同意后，我对广州市负责同志讲，他们同意承担这项任务，仅提出不知道为使飞机能够迫降在设计上有哪些要求。我告诉他们可以找军区空军联系，请他们提出具体意见。地方同志还提出打隧道缺乏经验，我请示江、孙后，改由工程兵派技术人员去协助指导。这项工程直到1973年后才竣工。当时没向总参和国务院报告，我不知道要报告，只以为我的建议首长采纳了，地方也接受了，承办了，就没事了。现查明国务院和军委有规定，修建这样的工程，必须向上报告。由我的建议增大了工作量，对人力物力财力是个很大的浪费。

那些日子里，刘如一心一意给毛泽东盖房子，深感这是光荣重要的任务。不知道为什么，1974年批林批孔中竟成了给林彪“另立中央”修房子，与九一三事件八竿子打不着嘛。

◇ 如此大机群，广州那边谁负责迎接

广州军区副政委卜占亚都承认了，广州军区怎么就没有人认账呢？

突破口选中了三个人。政治部李副主任，负责接待，他最厉害。还有保卫部长赵国南。副参谋长刘如最轻，虽然住在家里，但家已经变成监狱，电话撤走了，大门站上双岗。1974年“批林批孔”中，刘如失去工作。每天到办公室接受批斗，谁要你干的？多少电报？多少电话？你是具体办事的，你讲了你就没事了。

1978年刘如又被捆到“四人帮”身上。你为军区修建的指挥部显然是为林彪修的，既然为林彪修的，那理所当然是林彪“另立中央”的成员了，1978年5月，刘如被正式免职审查。每天不停地审问，交代。刘如弄不懂，作为副参谋长，他负责国防工程，有屯兵洞，有火力点，有炮位，也有首脑指挥部。修建了多年的指挥部工程，怎么就成了为林彪“另立中央”修建的呢？

这时又扯出“一号命令”。“一号命令”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全军指挥所进入战时指挥位置。10月22日，军委办事组下令各军区，从现在起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早日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1970年5月3日，又下达了组织战时指挥班子的补充命令，首脑防护工程，凡有条件的现应考虑平战结合的指挥体系，把战时一套精干的指挥系统离开城市，在原来的机关驻地进行一般日常工作和对外活动。司令部指挥系统搬家，不是林彪“一号命令”的产物，是军委总参让搬家的，是正常的战备工作。

刘如在整党中写的体会，说明了他的心迹。“文革”初，尽管自己很不理解，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领袖热爱和信赖，我从思想上是认真学习，努力紧跟的。尽管我没有造什么人的反，对造反派冲击机关，抓领导干部、抢档案、夺武器、搞武斗等进行过一些抵制和斗争。但从整体上说，那时是推行极左路线，思想受“左”的影响是不少的，在不同场合我都说过“左”话，做过“左”事。通过这次整党，在思想上做了认真的清理，总结了经验教训。一是重大政治性问题，不了解情况背景，不要轻易表态，绝对不要盲从；二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说违心话。

夫人张元惠坚决支持刘如，说我相信你，你一定是好人。

刘如坚决顶住，坚决不承认为“另立中央”修建指挥部。否则广州军区从上到下不知要有多少“冤死鬼”。政委讲，好好养病，出来工作。但政委肝癌去世，又算了。刘如从入伍到逝世的60多年中，前30年工作，后30多年却泡在漫长的批判和申诉中。1979年7月，刘如终于解除审查，待分配。

1980年，广州军区党委结论，“说错话，办错事”。

刘如的申诉“大战”还在继续，“错”在哪里？1984年广州军区党委撤销“说错话办错事”的结论，临时给刘如分配了工作，前任司令部研究室主任，后任武汉军区善后办副主任。1988年3月，刘如按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职务离休，也算最后的结论。

现在有时间好好读书了，诗梦绕，墨魂牵，家中到处都是满满的书柜。刘如报名上老年大学，学写诗词。他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查字典，一字一句推敲，一首短诗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写完还要四处求教。练书法，为练好一个字，常常几十遍上百遍地练习，琢磨字的每一个笔划。

刘如还积极补习文化，以后为《战士报》写了很多出色的文章。

90年代后期，刘如出任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但病魔终于击倒了他。2002年心脏病、血管瘤加重，连着两次大手术，心脏四支架，植入术和腹腔血管扩张术。数月后发现胰头癌，不久又发现扩散。他不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都坚持锻炼身体。没做化疗前，仍每天由夫人张元惠陪着走楼梯，从一楼走到十楼，坚信自己可以战胜癌症。刘如希望病好后，首先回家乡看看，再去西藏、九寨沟，还想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国家看看。除了旅游，还想研究历史、地理，历史……

去世前不久，刘如写了一首《浪淘沙？七十有五抒怀》：

回首忆春秋，
白发何羞。
不须叹息莫须愁。
鞍马烽烟已往昔，
岁月悠悠。

息影学从头，
再荡飞舟，
诗书为伴远王侯。
功过是非任评说，
应自风流。

2000年底，刘如的病情恶化。他向医生表示捐出遗体，最后为医学做点贡献。

遗嘱丧事从简，骨灰撒入大海。

~~~~~

## 【本刊专稿】

### 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

• 舒 云 •

九一三事件刚刚发生，第一个被关押审查的就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

胡萍是新中国专机的首飞者，长期担任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1952年，胡萍从哈尔滨一航校第二期干部飞行班毕业，分到西郊机场，他是为数极少的驾驶运输机成功的老干部之一。由他组建飞专机的独三团，并出任团长。独立单位都高半格，在陆军他就“独立”，独立营、独立团，一直在独立单位。后来独三团改成专机师，他是第一任师长，1955年授衔大校。提升空军副参谋长后，仍兼任专机师党委书记。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还没有专机，胡萍作为机长在印度飞机上为周恩来保驾。1957年，胡萍作为毛泽东专机的机长，突遇雷雨，与地面失去联络40多分钟，在塔台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团团转。飞专机管专机20多年，胡萍几次化险为夷，没出一点事，而九一三事件却猝然使他掉进十八层地狱。

### ◇ 我怎么能是“资敌罪”

1982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决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林彪提供飞机，造成严重后果，被判为“资敌罪”，有期徒刑11年。

“资敌罪”的大帽子就这样强扣到我头上了。

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有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要叛逃。

专案组说，不可能不知道，逃跑就是你主谋，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

我说你们尽管查，要查出是我制造的阴谋，我负一切责任，我并不知道阴谋。周恩来通过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知道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怎么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他，不要跟他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他们玩了圈套，现在想很可笑，但不能离开当时的时空。党办副主任何汝珍对我说，叶群问，胡萍这小子靠得住靠不住？何汝珍说，这个你放心，绝对没问题。叶群为什么问这个？那个时候说倒就倒，我心想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我不是想当官的人，我更喜欢飞行业务。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又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保住晚节？那个晚上我通知周宇驰，总理查问飞机了，但我并不知情。这是好人犯错误，而不是坏人办坏事，这怎么能叫“资敌罪”呢？

### ◇ 林立果学开车要“手令”干什么

我可以派飞机，但我怎么知道他们往哪里跑？我没有什么交代，确实不知道，我编也编不出来。查我，我也不知道谋害毛泽东。那时我在三〇一住院，左肾结核，切片检查，本来想马上做手术，又一想还是等凉快点再做。住院没什么事，就等手术。9月12日午睡后我回机场。下午6点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三叉戟。我打电话给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那天晚上在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手令”让我看。我曾经看见周宇驰苦练林彪签名，我还奇怪，练那个干嘛？是不是林彪的字，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吴法宪早有话，他要用飞机就用呗。以后我才慢慢想，他用飞机像用汽车一样方便，还要什么“手令”？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

我还想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32开纸，“手令”也这么大，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一个内容。下面是林彪签名。当时我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你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

但林立果明白，用飞机要从我这里过。几个关口，飞机要移动，必须经过调度室批准，才

可以放飞。三叉戟去北戴河正常，林彪在那里。本来三叉戟应该牵引到候机室门口，林立果不让，说我们开车过去，怕浪费时间。他们都安排好了，直接到停机坪，我没过去，后来听说他们拉了很多东西，搬上了三叉戟。

◇ 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周恩来查问三叉戟时，我正在候机室。

九一三事件前一周，吴法宪打电话给我，林彪那里要动一动，做好准备。林彪“动”都是临时，打个电话说走就走。又过两天，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来电话，主任说这两天准备走。到哪？说到青岛或大连，或到广州，没个准。我说行，早了解情况早告诉我，我好做准备。林立果让我为首长准备好飞机，这几天要离开北戴河，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胡萍说，我干这角色，不是一天两天。庐山会议，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叫我开会，怎么把所有的中央委员都送去，哪省哪省，要一个名单，拉这么多人，别人不让上，保密。大机群活动，二三十架飞机，没上头命令，我敢这么干？

吴法宪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飞机，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过我了。注意保密，飞机呼号临时改变。我冤屈在哪儿？我是管专机的，林彪坐的那几架飞机，都有准备。电话一来，马上就出发。从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文件，几乎每天都有飞机为林家服务。太频繁了，容易泄密，吴法宪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飞机，由你掌握，以训练的名义。这在内部很平常，别的首长也这样。改航线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说到上海，实打实，起飞后沿途雷达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说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发几条到其他地方的航线，专机飞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务派遣程序被取消，连飞行中起码的空中联络也被限制，只准按下发话键，而不能讲话，至于飞机上拉的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声东击西，这在全国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中司空见惯。

9月12日夜里，吴法宪在候机室对我说，准备一架飞机去北戴河。他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说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起来了，他去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准备去。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

9月13日，我准备回医院，我有车，可吴法宪说，用我的车，张秘书送你。实际上监视我，怕我跑了。李德生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林彪去北戴河前，吴法宪交代准备飞机，李文普也打过招呼，过去都是这样办法，出了事，都推了。伊尔-18拉警卫，一架飞机装汽车，两架直升机用于视察，林彪“动”，都是这样，这就五架，还有一架空飞上海，我不知道要接谁。非说你搞阴谋，我为他们辛辛苦苦服务20多年，任劳任怨，谁知道他们搞这玩意儿。硬说三叉戟飞苏联的阴谋是我搞的，周总理为我说话，说不要追了。我与中央警卫局政委杨德中关系很好，他来看我。第二天专案组说，你要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替你说好话。周总理一清二楚，了解我，他不死，我的结局会好点。那天早上就把我关起来，杨德中把我送到中央警卫团的营部，住了两夜，又送到亚疗。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永胜）吴（法宪）。我没头没脑，什么“黄吴”？我一个字没写。又住了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念文件，我才大梦初醒，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是阴谋，出了事，没理可讲，我说有什么用？

◇ 胡萍为什么改名胡萍

胡萍，1923年生，山东乳山县人。暴发户，靠银行、土地、山峦生活。家中二三十间



房子，一百多亩地，雇长工种地。父亲是国民党区长，社会名流。这样的家庭出身，不要说专机飞行员，就是空军一般的飞行员，也早被刷下去了，怎么就能通过年年岁岁的严格政审呢？

我家是革命家庭，我8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是革命老太太，脑子灵光，家里是革命者的据点，被抄了家。我是老小，上边两个哥哥，父亲比较注意老大的上学问题。我两个哥哥上学等级都不高，没上大学，但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青岛德国教会学校，受的教育等于大学。因为学校里有地下党，两个哥哥很早就是革命者。大哥是烈士，开书店，是地下党据点。二哥在教会中学毕业，留校做了一年革命工作，以后担任胶东大众日报社长，解放后在武汉任宣传局长。

我上的烟台八中，高小毕业没考上师范，1937年在山东海阳县做青年工作，1938年我任三区区委书记，1939年参军。青年人嘛，参军打鬼子。我原名孙传芝，参军后改的名字。为什么叫胡萍？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我参军就是干部，县里有几个中队，我当过副指导员。1941年右胳膊负伤，我背着手拿枪，子弹过来一排，打中了还不知道。是贯通伤，没有什么药，盐水纱布从中间穿过，来回洗，现在两只手还一大一小。伤好后就留在后方，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当教导员，那时我还不到20岁。

◇ 抗战两次负伤，抗日勋章却不给他

宣布日本投降是最好的消息，胡萍在东海军分区后勤宣布。大家坐在背包上开会，哗地跳起来，鼓掌欢呼。这时胡萍第二次负伤，还没有养好，伤在左手腕，也是贯通伤，有三级残废证。他两次负伤都在抗日战争中，但抗战胜利60周年发勋章，却没有他的份，说他没有单位。

就是在东海军分区后勤，胡萍和刘继馨谈上了对象。解放战争三查三整，质问为什么地主找地主？团政委是老红军，有点文化，对胡萍说，不要在意，过过风头再说。

刘继馨家也是大地主，家中有皇帝的诰命书，那一代最大的是进士，三袍玉带。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刘家的。刘继馨的父亲是开明士绅，曾在威海教会中学上过学，在村里办小学，教英文和音乐。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家里成了抗日据点，山东好多元老都在她家住过。后来暴露了，抓了五六次，父亲终于被抓住，40多岁被杀掉，眼睛都被挖掉了。家中七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在北京读书，解放后当了江苏省委书记。六个姐妹都念书，地在哪里都不知道，长工说了算，很快破落。刘继馨1945年考上东海中学，这是革命中学，供给制，几千人考试只收几十人。没学多少东西，学校解散后她分到东海军分区后勤。

胡萍是单位的活跃分子，爱说话，爱打球。刚开始有一个文工团员喜欢他，但嫌他出过天花。在刘继馨眼中，虽然他脸上有麻子，还是很帅。胡萍负伤后好几年用左手写字，左手还写这么好。刘继馨刚参军就很欣赏他，但谁也不主动，后来他一提，刘继馨马上就答应了，1950年结婚。

胡萍是十兵团三十二军二八四团的团政委，带部队走了几个月打到福建，任福州警备区司令员，是当地最高首长。正值在陆军的基础组建空军，从陆军挑了一批飞行员，还需要一批飞行干部。1950年刘继馨和胡萍一起到南京体检。27岁的胡萍被选上了，到哈尔滨一航校学了两年，空军领导好多是他同学。刘继馨留在南京华东后勤报社当记者。

自从飞专机，胡萍整天不在家，什么都保密。刘继馨说，我只知道他给中央首长飞，关于飞行的危险，他说过一次，飞机外壳结了冰，危险极了，还继续飞。别人都说他胆子太大，但有故障他坚决不许飞。欧洲几条航线是他开辟的，连续飞20多个小时，没出过事。到那些国

家，有的输油管爆炸，他一出去，我就担心，落地了我才放心。

#### ◇ 硬说我们要暗害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刘继馨带着7岁的女儿在青岛空军疗养院。早就想回来，但与西郊机场联系不上，没有飞机，老也没有消息。

9月20日左右，西郊机场叫我回来。到了北京火车站，我要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和女儿还穿着单衣，冻得不行。好不容易作战科长带着吉普车来了，营门不让我进，让我到俱乐部，说有点事，先到外边住，不让回家。当天就没有了自由，派两个人看着我。女儿送回老家，婆婆也被送走。两个儿子当兵，大儿子在一航校，飞行都飞出来了，马上停飞，单独复员，二儿子在空十三师当机械师，也复员了。两个儿子的工作不能分在一个方向，大对角，一个在顺义，一个在良乡，不能叫他们串连。

很快我被关进空军学院的学习班，我连被子也没有，给找了一床黑极了的被子。说是学习班，实际上就是监狱，窗户都用纸糊着，上厕所打报告，写材料的纸编上号，不准说话，一人一间房子。学习班还有王飞的爱人萧新，军务部长杨采章，朱铁笙等几十个人。

我那时是西郊机场幼儿园团长，我什么也不知道。说胡萍是反革命死党，叫我揭发，还说我到青岛是阴谋，派我去了解毛泽东的情况，想暗杀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前夫人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也在青岛疗养院。李敏要见毛泽东都非常难，贺子珍就更见不上了，想暗杀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在海水浴场，怀孕的李敏没下水，贺子珍下水。我们还一起打扑克，陪着贺子珍玩，故意输，让她高兴。贺子珍脑子非常好，很能干的人，我还与贺子珍去了一趟威海。李敏的儿子和我女儿同岁，也玩在一起。就这些内容，把我在青岛写的家信都抄走，叫我背出来信上都写了什么，漏了一句更不行，我哪能背得出？李敏的儿子应该叫贺子珍姥姥，但对外叫奶奶。如果说不清，奶奶说成姥姥就是阴谋。

关了快三年，1974年初看我实在没“油水”，把我赶到农村。土改时地主一样待遇，扫地出门，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说你是反革命家属，应该斩草除根的，毛主席关怀，给你一条生路。没给结论，不算敌人，方向路线性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叫我在我和胡萍家选一个地方，我选了胡萍家乡。我带着女儿在村里劳动五年。一直在城市，突然到了农村，一年劳动下来，我连分的400斤粮食都买不下来，靠我广州的妹妹和胡萍的哥哥给一点钱，把粮食买回来。女儿在家念书，连铅笔都买不起，胡萍的战友找来几只长毛兔，我扯兔毛卖，扯得我的手都肿了。我还是爱看书什么的，买不起字典，今天省几分钱，明天省几分钱，积起来，买了一个字典。晚上收工回来，我就在小油灯下写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一天到晚，累得我没办法，神经衰弱，好在村里老乡对我们特别好，否则真不知道怎么顶下来。

1980年下半年，三十四师来信叫我回北京。

#### ◇ 整整十年，生死两茫茫

将近十年，房子早收走了，家中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光了，文物、书、财产甚至连日用品都没有。胡萍的消息一点也没有，是死是活，我连问的地方都没有，也不敢问。1980年底，胡萍被监狱安排在二六二医院体检，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同病房，四个战士陪着。为什么这么安排？不知道。这时可以探视了，第一次见面，胡萍的脸肿着，变了样，监狱发的衣服，补得像渔网一样。他身体虚弱，只有精神还可以。1981年底胡萍出狱，1982年我们去山东潍坊。胡萍的关系放在那里，允许每个月“借”100元，后来增加到240元。2

003年实在生活不下去，我又去找，空军干部部说中纪委有文件，2000年就增加了生活费，增加到650元，一直到现在。

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学校拔尖，作文几次被收入地区的小学生作文选。1978年女儿考上大学，我决定回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外边租了一间六七平米的房子，“窝”了十几年。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上访近一点。我回来一找，就恢复了我的党籍，但胡萍的问题毫无进展。慢慢地，胡萍走路老撞墙撞树，我们也不懂，到空军总院眼科看，没什么毛病。其实是脑瘤越长越大，把视神经挤了，所以视野很小。老医生知道胡萍是空军的老人，对他很好，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是不是脑血管硬化？一查发现脑瘤，1984年手术。术后胡萍逐渐失明，1994年完全看不见了。

也是这一年落实政策，西郊机场给了我两间房子。1986年给我办了离休。

这么多年，这么难，一切自己承担，自己包下来，如果他身体好，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家有长寿基因，他哥哥每次运动都挨整，现在90多岁了还活着。如果他没有这个事，能得脑瘤吗？身体能这样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接受不了，太残酷了，太痛了，不叫杀人叫什么！上哪儿找公道？历史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叫他承担？至少生活不能这样，起码给最低的生活保障吧。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战犯，待遇那么高。只要生活过得去，我一切都会忘掉！

◇ 历史会搞清楚的

很多年前，我就多次采访过胡老。那时他已经因脑瘤手术而双目失明，但头脑清晰，他一字一句地回忆了那个不可思议的黑暗时刻。如今很多年过去，胡老的身体越来越差，几次报病危，在老伴的精心照顾下，他一直顽强地活着。采访结束，一直没有说话的胡老慢慢地说，我这一生还不错，没胡来，如果干过坏事，我不埋怨任何人。我拼死拼活干一辈子，流过几次眼泪。最后弄成这结果，历史会搞清楚的。

~~~~~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二）

• 徐海亮 •

四、“枪打出头鸟”

7月1日，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提出：“在我们中宣部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问题。”同日，湖北省委派出以王海山为组长的30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部级单位，以下简称“长办”），组成一个五人小组接管长办党委的权力，其中吸收两个长办的人参加，其他人全部靠边站，并转移运动方向对准林一山主任。这是继武汉大学后，出现的又一个接管党政权力搞运动的范例；实际上，长办是水电部的派出单位，主任由周恩来任命，湖北省委过去对其主任林一山尚无什么太大的约束能力。

针对运动情况和问题，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写信，以信文形式指导运动。该信认为大中学校运动处于三种情况：“1、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但不多。2、水利电力学院，正处于大暴露阶段，左

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摆，左派领导尚未形成，右派还没有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3、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搞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难解决”。从王任重原来在武汉掌握情况和后来省委汇报看，他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目前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基本估计和方法，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

研究武汉文革和群众的王绍光，曾在1988年出版的一篇文章《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里，指出王任重6月28日的报告《建议》和7月3日的信文《意见》，“都被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转批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武汉，他们相信毛泽东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据王任重说，直到七月十八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毛泽东还没决定怎样把刚刚开始的运动进行下去”。王绍光这里讲述和分析了两个重要事情：其一，王为湖北省运动写的意见，实际上也是为指导全国运动起草的，而且刘、邓、陶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赞赏和批转了这两个文件。其二，从王的口中，披露出毛泽东在武汉时还没有决定运动如何深入。前一讲述和推断是符合实情的，后一“据说”，笔者没有见到王本人对此的言论、文字，不过从王与毛泽东相处20日，他似乎并未感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和毛泽东有差异，似也能推出毛尚未对王任重全部交底，或者毛对他不置可否？王绍光在1993年出版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汉文部分《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有一小段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作为一个慎重的政治家，王任重把这封信呈送给了6月28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听取意见。毛似乎没有表示反对，可能由于得到了毛的赞许，王的信7月14日由中南局传达到中南地区五省然后又由中央传达到其他各省，于是湖北省被看作是全国的样板”（该书，P37）。以上所引文章和专著，都出自作者的一个研究题目和内容，他的基本分析和判断也是一致的。由于笔者无法得知当时王任重和毛泽东的往来对话情况，目前只能认为这些关键说法，仅仅是一个推断。不过，从毛、王在文革全过程的思考和作为看，这个推断可能是合理的。

7月上中旬，武汉各高校先后展开了类似北京“反干扰”的，以打击学生、教师群众为主的“反右斗争”。斗争里，学校中普遍出现了对于形势的争论，主导性的论点为1966年是“57年加58年的形势”，矛头所在十分明确；但是，情绪逆反的学生论点是：文革是1966年的形势，是“23条”说的主要斗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形势。二者针锋相对。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他好像对武汉高校发生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省委是如何汇报的？

6、7月，武汉大学工作组在批判李达“三家村”的革命旗号下，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横扫，把文革变成打知识分子中的“牛鬼蛇神”的运动。武汉大学群众要求1950年代的二刘书记（刘仰峤、刘真）回学校参加革命，刘真得到省委通知，从汉阳杜家台的四清第一线回到武汉，王任重正在东湖宾馆，见面就对他讲“你们是左派”！遂派往武汉大学，加强工作队。不久，刘发现武汉大学执掌运动者并不真正欢迎他回来，在学校无事可做。7月上旬，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让他立即去水利学院抓“三家村”，按王7月3日信的指示精神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分子；10日，新组成的工作队就在刘的率领下进入水院。

今天来看，王任重书记当时并未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实际意图，或者毛泽东也没有全部交底。6月15日毛泽东前往中南途经江西，在南昌就对江西省委领导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这种想法，既然可以给江西省委讲，自然也会给湖北省委讲。此话当年并无人知晓，但学生们确实就是如此去思考的，所以他们十分自信：自己是响应毛泽东号召的。毛泽东的意思自然也一再与王谈及，他在28日从韶山到武汉，住东湖客舍，掌握运动走势和动态，与王有多次深刻接触（甚至还将7月8日给江青的要信给王读过。那时毛泽东还在客舍接见余秋里和农业部长林乎加，商谈农业机械化问题，让他们看王任重湖北的样板；在毛的支持下，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于20日，就在距毛7月18日前下榻的梅岭一号200多米的小礼堂召开）。

不过王心目中应当得到锻炼的青年人，是他和省委内心钦定的传统体制认可的“当然左派”，而非广大群众；“大风大浪”，也是针对社会上所谓“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后来，省委领导和各级领导同志与学生群众对毛泽东概念里的“敌友”认识的根本冲突，也始终在于此。“当然左派”是那时在武汉大学运动里流行的话语，也典型地代表了1966年湖北武汉一种带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现象。

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所编辑的大事记：7月5日，省市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运动初期，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约400余人（其中中学生159人）。这些做法自然引起群众的恐怖和不满。

据武钢工人杨玉珍口述回忆：“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武钢的四清工作队长是陈克东，他们因为随便镇压工人，草菅人命，因此引起武钢第一技校学生的强烈不满，这是武钢在文革开始第一支起来造反的队伍。当时综合厂的工人庞玉来，因为要向工会借钱，姓蔡的女会计不同意。大概当时大家吵了几句，庞玉来脾气不好，拿了一个砖头把姓蔡的头上打了一个口子，缝了几针。工作队长，就按照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布置，做出决定枪毙庞玉来，还说是‘要血债血还’。1966年6月19日这一天，天下大雨，庞玉来就是在这一天被他们枪毙了。武钢第一技校的学生全部都冲出来了，大家都不服。结果运动就这样偶然地发动起来了。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钢铁研究所为了辩论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事情，发生了冲突，打了起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在6、7月，省委对于学校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十分紧张，简直风声鹤唳。7月6日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3号的信，就是一例；王本人也在武汉参加这次常委讨论：

张体学：谈的三种情况，是不是符合当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大量的，左派还是没有形成，右派掌握领导权。……

王任重：工作队整一下，要斗争。先把打兰正明的人抓起来，管他是什么人，先当现行犯抓起来。

张体学：广播电台一个姓黄的要开除党籍。

宋侃夫：准备搞控诉，把打人的家伙搞到东西湖去劳动。

王任重：打人要按照刑事犯处理，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可以肯定陈伯华（按：市汉剧院院长）是团结对象，要打击的是几个老右派，还是那几个人在兴风作浪。陈伯华那个人对党还是有一定感情的。陈伯华这个人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作风，没有问题，她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不当敌人斗争，陈伯华是可以接受的。（侃夫：劝她退党）……

张体学：陈伯华不当院长，工资降下来，是不是党员留下来。

王任重：暂缓一步，当不当党员的问题，有一些人，陈伯华、常香玉、红线玉、陈淑芳等人。……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

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你要拿刀杀，我就要打，纠察队要拿上棍子，反革命分子要我们交枪，就把他抓起来，有的人叛变了，叛变投敌要开除党籍。

张体学：任重同志写的这封信，我没有意见，个别地方改一下。

显然这仅是一段记录，但大体看出，王任重的信实际成为将文革运动变成镇反和反右的号令了！这就是造成1966年王与武汉拥护毛泽东革命造反号召的学生决裂的标志性文献。

现在可以看到的陶铸对中南情况估计，几乎与王任重差不多，只是没有那样具体。7月12日，陶铸电中南局：1、文教是重点，这次不搞好，就无希望了。2、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始终。3、区别两类矛盾。4、控制面，可能比一九五七年面大。还是按二十三条，干部分四类，集中打击第四类，排队，学生一般不排，大学生在内。5、教学改革，学生热情很高，中央准备研究。周扬的批判，一下子还上不去。7月15日，陶铸再电中南局：1、战线太长，同意收缩。2、斗争锋芒对准工人，要纠正。湖南中学工作组退出后发生打击报复现象，应处理。长沙学生打招牌，制止。乱斗，教育。……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随同。毛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毛一语双关，得到全部武汉群众首先是学生的拥护和认同。他们用数年来在毛泽东榜样激励下的热情和坚毅精神，投入了文革——这一搏击社会风浪的锻炼。游泳活动成为领袖与民众互动的契机，也在武汉成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与标志，不是偶然的。

也就是毛泽东在武汉同时，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学生群众。华中工学院抓“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按“七三信件”精神，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4名学生（其中以“杀人未遂”罪名逮捕一个团支部书记），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一学生对院党委和运动有怀疑，不听工作组劝阻，先去省委找运动领导小组，既而自己买票上北京找王任重反映情况，也打成“反革命”。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300多人，仅外语系就达64人，某小班批斗12人，发生被逼写血书和试图自杀的严重事件。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1400学生，就批斗200多人，“反右”长达23天。在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62人，已确定性质的29人，一位讨过饭的贫农儿子被逼写血书。在建筑工程学校，全校500多人逮捕18人，批斗30多人。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6.10”（化学系）、“6.11”（外文系）、“6.18”（哲学系）、“6.20”事件，涉及一大批师生。

这些活动，多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由学校各级组织和工作组拟定所谓左、中、右名单，通过组建“工作组保卫组”、“动态反映组”或原来的单位保卫科、“治保组”和內定的左派影子结构，监视、跟踪师生群众，收集、整理材料，冷落和边缘化部分群众，疏远打击一些仅仅认识不同的学生干部，无理剥夺学生参加横渡长江和声援越南游行的正当权利，以至公开批判斗争群众。在运动初期，武汉全市以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批准逮捕学生和工人群众400多人，骇人听闻，全国也绝无仅有。本来群情高昂的政治运动，弄得恐怖十分。更为深远的是，原来并肩一致参加文革运动的普通学生，从此被人为地划分为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派，出现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对此认识不一，人的政治待遇迥然不同，群众被彻底分裂了。今后还将看到，分裂难以愈合，竟然走向极端的派别对立。

当毛泽东在长江畅游的消息被激动的师生带回学校时，天真的学生好希望王任重书记向毛主席反映运动情况，搭救受委屈的群众。可是，“反右”继续下去，痴情学生不知为什么，当时还不敢想王书记没有给毛泽东汇报一切实情；后来省委也一直以“毛主席在武汉，他老人家知道运动情况”为由来稳定和凝聚群众的信心，要求群众相信省委，以至保卫省委。

王任重和陶铸不喜欢倚老居傲的李达，李也确实对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有异议。特别在1966年，林彪和中南局都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他不赶时髦，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提出不同看法。陶、王决定对他下手批判，自然也出于他们理解 and 政治需要。不过，他们深知李在中共历史里的位置，以及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交情，王胆敢公开批斗李达吗？据说，在文革以后有人询问王任重当年为何抛出李达，他回答的就是：我有那样大的胆子吗？有人甚至公开透露，王在决定批李前，也曾打探过毛的看法。只是毛、王二人的交谈，并未公开，王仅仅是试探毛的意图，还是正式请示过？毛表示过同意交群众公开批判吗？

在7、8月的高压气氛下，李达很快就走到人生终点。李达在临死前几天，还请求他的秘书给毛泽东送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但被工作队扣押再邮寄，毛泽东在8月10日才看到有关的一张字条“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毛当即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 八月十日。”陶铸也当即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张体学省长从北京参加11中全会回来，却向武汉大学“校革委”传达毛泽东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在持续的残酷批斗与迫害下，李达的确是死了。

弱勢的学生群众崇尚公正，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强；特别是武汉大学在运动初期受到压抑的教师和学生，从大字报读到李达重病惨死的情景（鲜血喷吐墙上），反过来却同情官定的“黑帮分子”李达（一些教师自己已经被指定为李达的“黑帮分子”），怀疑王任重是妒忌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进而怀疑王在李达问题上反毛泽东的。这些师生均成为武汉大学造反派的坚定者。经1966年的酝酿，他们在1967年4月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可能是彻底否定文革以来，多数人并不明白的武汉文革造反的一桩公案。

五、转折的关头

就在李达向毛呼救前后，毛泽东主席回到久违的北京，毛批评前段运动，愤怒指责弄得“冷冷清清”，“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文革运动的根本分歧很快就公开化了。

7月21日，经陶铸审定，中南局发出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内容包括四点：一、重点调整部署，适当收缩战线，目前运动的重点应当是省（区）、市、地党政机关中的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学术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二、必须派出坚强的工作队，目前的情况是，工作队数量不足，骨干少，质量不高，省（区）、市党委必须下决心从党政机关和城乡四清工作队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文化工作队；三、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四、具体政策，如国家干部和职工中重点批判对象，由上一级党委（机构）批准……等等。7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高等院校的运动问题，做出四点指示：一、斗争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斗争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三、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但是，对于备受争议的工

工作组，刘少奇争辩，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考虑到毛泽东的尖锐的反对意见，7月27日，陶铸匆匆向刘少奇建议，“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当晚，他再次和刘少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

这时，王任重指导北京的运动，28日，他在争论十分激烈的清华大学讲话，讲了个十分原则话：“我对清华情况不了解，……究竟谁是谁非，同学们自己独立思考。对不同意见应当用毛泽东思想分析，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镜，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照就照出来了……。”“任何是非问题不是什么人可以包办代替的，只有靠同学们自己去分辨这些不同意见，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很好的，真理只有一个……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决定于清华革命师生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动脑筋，打倒黑帮要靠你们，教育革命也要靠你们……”。这些话讲得很不错，可是从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发展来看，主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王任重，虽然没有在武汉直接碰钉子遭至反对，却很快在清华大学运动和北京的运动碰了大钉子。作为他个人悲剧的是，他并未从中央两位主席的分歧意识到什么根本的东西，他在中央文革的失落，也就从这时开始，虽然武汉运动出现的种种不利的消息，这时还没有传到北京和毛泽东的耳里。

不过，北京的一些新精神，很快就由王任重传回省里，7月28日左右，他一个紧急电话打回武汉，各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争群众的活动，突然紧急煞车！

于是在7月30日，省委常委按当时的认识也认真地讨论和回顾了前段运动：

陈扶生汇报：省委在6月10日以前，召开两次紧急会议，组织工作组进学校……群众热情高涨下，也出现了一些混乱，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反击。6月23日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宣布政策，大会开的还是好的，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也有唱反调的，说调子低了，旗帜不鲜明，……从目前看，大多数单位转入反右批判。……狠抓炮打司令部，“擒贼先擒王”，一种是没有把要害人物搞出来；二种是批判斗争一批学生，共搞了254人，13所学校。

湖北大学的问题，文化革命办公室有责任，提出要反击，学生受了挫伤，领导集团问题揭不开，学生情绪苦闷。有的写血书：“不拿枪的敌人不好打，干脆支援越南去”，有的写错了大字报很害怕，有的却说：“反右派不说话，反左派不说话，整队还是不说话”。发生这些问题，我们要主动担担子。（体学：学生中反动的，放在运动后期批判，现在搞，斗争了一个，会影响一批。）……（体学：有极少数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干的，要分析一下。）

张体学：一、对全省运动的估价：总的讲，运动搞得好，搞得不错，绝大部分单位是搞得好的。对全省运动要一分为二看，是主要的，成绩是主流，发展很健康，搞得很迅速。但对“二”不能忽视，“二”就是问题。今天着重讲问题，不等于否定成绩。产生问题有几个原因：对伟大的革命运动，思想准备不足。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我们的思想准备不足，有一点仓促应战。派工作组一下铺开了。……这个运动不同于农村。又同又不同，阶级斗争是相同的，作法不同，一下铺开，大规模的运动，没有经验。

斗争方法，领导艺术交代不清楚，不具体。对学生的问题当时也不那么明确，派工作组派多少讲得不清楚，工作队本身是临时组织的队伍，临时上战场。工作队既要领导革命，又要自我革命，思想不明确。广大的教员学生热情很高，有强烈要求，工作队跟不上形势，带了不少的框框，总的框框就是怕乱，怕坏人乘机活动，工作队本身民主作风，“三同”没有搞好。

产生以上问题是暂时的，个别的缺点，省委承担责任。……另外，具体政策没有跟上去，学生说怪话，大字报写错了，不整学生，这一条思想不明确，我们省委负责。你们整了学生就检讨，没有整的就不检讨。……

运动中斗了学生，完全斗错了的要赔礼道歉。水利学院上北京去告状的两个人放下来，以后处理，一不要批评，二不要斗争，先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将来发展了再当外部问题处理。……有些表现很不好的，有活动的，也不要监视他，叫他暴露，暴露了，群众总会批评他。……我们的工作队现在不宣布撤出。撤不撤？等任重、道琦回来开会研究……

显然，湖北省委业已感觉到运动出了问题，但又原由不清，处于矛盾和被动，举棋不定。

而在同日，赵紫阳、区梦觉从北京匆匆写信给林李明、张云、王阑西，对撤退工作队，就作了紧急布置：“……三、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向师生员工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进行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教育。……条件已具备的地方，可以先选举建立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条件还不成熟的，要积极进行准备和筹建工作……工作队多的，逐步调出一些，或集中到工作队部学习，大学的一个系，留一两个人就可以了。四、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大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如果出现群众贴工作队大字报的情况，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群众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主动接受，立即整改；不正确的，可以正面说明情况，但也应当抱着欢迎的态度，绝对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压制群众的批评”。

湖北与广东两省领导，对当时北京的精神领会似乎不太一样。广东从陶铸处得到指示，准备抓紧主动整顿工作队和撤退，关于湖北，王任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几个月的做法，与毛泽东倡导的大相径庭呢。本来他在湖北的工作政绩凿凿，在经济工作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夸他有总理之才；文革运动大事，毛也亲临东湖一再托咐，当年在武汉、杭州的许多决定运动的要会要事他都参加或参与了。从他的一生看，王对毛泽东也是诚心拥戴的，特别是文革以后更能看出人的真心；在1979年后，他几乎被人们看成“凡是派”。但毛泽东苦心提携的中南“王”，在1966年春夏，并未真正站在毛泽东希望的一边，他频频聆听毛主席教诲，却充其量扮演着一个中南“小刘、邓”的角色。这个客观事实，当然无法简单地用后来造反群众指责的“政治品质”“反革命两面派”来解释，也不能用个人或个别人物的偶然疏忽与谋略来解释。是历史的误会？是意识的局限？是毛泽东的过错，还是陶、王的悲剧以及他们与毛泽东一代人的整体性悲剧？这些只有留待后人来研究了。

需说再次强调的是，1966年5月至7月，在武汉尚未出现北京那样的驱赶工作组事件，学生群众还没有发展到怀疑和对抗省委、市委。运动的主导方面，在省市市委和传统的党政权力组织一边，90天运动的主要史实，是群众开始起来投身毛泽东号召的文化革命，当局组织打击所谓“牛鬼蛇神”的历史。说明这点是必要的。因为迄今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著和文献，主要地以北京高等学校的文革过程，来分析所谓“50天”的运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 and 分歧，这显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场浩大的政治运动，仅仅去研讨京畿地区学校、机关的情势和领导、群众心态走向，还缺乏研究许多问题的充分条件。

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性，北京学校与武汉学校学生结构的差异性，北京学生的信息来源和敏感程度、接受反馈程度，远远优于地方学校，他们任何一个准派别群体，都比武汉的学生要激进得多。特别在6、7月里，北京原来的高校党政系统已经瘫痪，新市委的权威没有建立，

由各部委部门匆匆派出的工作组，也不可能把握运动的控制权，不论他们如何做，都与部分学生发生分歧乃至冲突。毕竟原北京市委天经地义已是黑帮。武汉则大不一样。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所有群众心目中，依然是革命的，是有政治权威的。学生起来参加文化革命，首先还是希望通过得到省市支持，去表达革命要求与一些对本单位领导的怀疑与不满。直到后来省委撤退工作组，他们都还没有发展到要公开驱赶工作组的一步，仅仅在个别学校有嘲讽刁难言语出现，有个别先行者开始按自己的理解，将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怀疑成修正主义分子，产生试图摆脱这些领导者的愿望。不少造反的骨干分子，后来也都承认自己当初并非目标清晰准确，有个认识过程。北京学生革命造反的动因与地方学校学生造反，存在一定的差异，北京学生首先特别关注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而且受到中央情势的影响；而地方学校的学生，在努力跟进北京形势同时，必然地联系当地的矛盾冲突，矛头主要指向地方党政权力机构和代表人物，更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情绪影响，关注和卷入一些社会问题。这些特殊现象，在八月以后的运动就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章．初秋炮打司令部

一、贯彻中央新精神

入秋，湖北省委开始传达和贯彻北京传来的文革运动新精神。1966年7月底，省委紧急停止各院校的“反右”批判斗争，决定撤出工作组，改派联络员观察指导有关单位的运动。8月12日，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从北京电话指示省委，要求在15日前按“16条”精神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领导小组，接替工作组对运动的领导。按此指示，8月下旬各院校相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陆续有组织地成立红卫兵（时称“多数派”红卫兵）。初秋的武汉还是十分炎热的，长江流域的“秋老虎”并未让革命热情不减的学校师生精神倦怠。运动也有组织和有序地进行着。

8月2日，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听取了7月29日北京市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中央领导的报告录音，正面地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成绩，表彰了各学校产生出来的运动积极分子。武汉市委决定逐步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并开门整队。

8月3日，广东省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传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学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但工作队问题成了会议的讨论主题。在讨论中，刘田夫问：“工作队撤走后，如何使运动搞得更好，将来也要派些人去了解联系。如何抓革命委员会？”林李明回答“按北京的样板做。”林在会上还批评说：“广州大专院校，没有反击这是好的。但由于没有经验，出的问题和全国也差不多，包办代替，‘我来解放你’到处有，不放手，怕乱。工作队与学生的关系，也不清楚。对意味不相投的，不听意见，也不少……不能把我们的工作估计太高了……学生贴大字报说不要上修正主义的当，而工作队（学生）说他们是修正主义。选举委员会，学生提出意见，是工作队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提出意见，你们征求人家意见，又反过来整我们……我看过我们听工作队的话多了。”

不知什么原因，同一时间，湖北省委尚未如广东这样地认识工作组问题。

省交通厅航运局工人出身的干部傅廉当时在随县搞四清，今天回忆说：“十六条下来了，在讨论时我说这个工作队最好是撤，与毛主席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而且有些事情完全是捕风捉影……按照文件是我们工作队错了。……晚上一点钟，就有人拍我的门，说县机关分团团长邓强找我去，他说我在会上发言不应该，我说工作队确实与十六条不相符，他说张体学要亲自找你。第二天张体学打来电话，我说我是傅廉，他说‘咯狗日的快来’，要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劈头就说：‘你还反了，叫工作组撤，你当了这是航运局，他们姑息你’？我说自己只是开会

说意见。他问我思想通了没有，要我写检讨。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回武汉，李树棠说张体学说你没有资格当工作队员，通知要把你遣送回去……我回到单位门口，就看见有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傅廉。”

8月16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从北京回穗，传达陶铸的指示“华东、中南地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各省是否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看是否实行反击，如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那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反之，就不是。”赵说，“我们这里没有进行反击，没有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所以不能说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

但陶铸的这个精神，湖北没有传到基层，湖北省委和各个单位，自恃有王任重的精神，并不承认因为在群众里打反革命，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工作组撤走，酝酿成立文革委员会，许多高校组织了大辩论，大家蛮认真地辩论前一段运动方向正确与否。到8月中旬，这种辩论仍然是赞成6、7月省委作为的干部、群众舆论占优势，群众显然不明白北京究竟出了什么事，报刊舆论发生了什么变化。持不同意见的极少数人，用较为温和的言辞，批评前段运动，说反击右派挫伤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武汉水利学院三年级同学韩同良、丁家显、韩玉琢，以三个贫农子弟名义写信给工作队队长刘真，悲壮陈词，申明青年人搞文化革命的目的，批评工作队主持反击打击了热心参加文革学生的积极性。该信也成为辩论的中心议题。今天92岁高龄的刘真，依然记得这封感人的公开信内容，或许当时就触动了他的情感。高校学生对成立文革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选举。从书本原教旨意义追求革命，青年人都醉心于中央文件“16条”倡导的巴黎公社民主制度原则，少数受过压制的群众冀希望通过理想化的民主辩论和选举，达到长期被压抑的自我的实现；多数同学——特别作为政治核心的学生干部和前段运动的“左派”骨干，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从来就是讲民主集中制的，且仅有他们才能显示和实现这个真正革命的民主和集中；而所谓的“自我”，也无非是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自我，对于资产阶级，本来就不应该给它什么自由和平等。不是说要撕掉“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吗！

按省委意图，“纯民主”选出来的文革委员会，是8月多数派倾向主导的权力组织。

为响应北京的运动，8月19日，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11所大中学校学生表示支持革命小将。武汉市委组织5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同日，武汉由党委组织的红卫兵正式成立并上街游行亮相。迄今为止，这些活动均为支持省委工作组运作的多数派参加；辩论中，学生群众中首次出现“派”的称谓，而他们是多数派。与其相反，在6、7月运动里受到疏远、排斥、打击的群众，开始被称为“少数派”。少数，在当时的舆论和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激忿，一往无前，深信自己是忠实于毛主席和革命的，坚持“干革命”的自我实现。他们也相信刚刚公布的“16条”中说要保护少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就是有所指的，甚至认为真理开始就只能在少数人手里！

下旬，印有“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传到武汉，多数人不相信这竟会是毛泽东亲笔所为，有人甚至认为是伪造来炮打共产党的（1957年报上赫然标题就有“储安平炮打毛泽东”），且文字所涉及党内斗争问题，究竟何指，更无人知晓。武汉钢铁公司里两派分歧，就是从工作队镇压工人和辩论“炮打司令部”的真伪肇始的。不过，毛泽东8月1日的回信由王任重转交清华附中红卫兵，毛泽东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们再也不会怀疑了。后来，毛泽东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加写的批注也传到武汉，毛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领导未必等于真理、等同正确，极大地鼓舞了对前段省委的运动做法持怀疑与抵制态度的人。

下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北京学生讲话录音，经省文革领导小组指示在各校播放，学生开始纷纷议论北京运动，刘少奇乡音浓重的说“这个运动么子搞，老实说，我一也一不一晓得”使人万分惊异！北京出了什么事？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报道有所变异，大家隐约感到中央在人事上有变，但还不敢胡乱猜想。

8月下旬，所谓破“四旧”兴起。武汉党史大事记云：以武汉市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仿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武汉市委为支持红卫兵，决定改换所谓具“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时，抄家、游斗浪潮迭起，泛滥周余，事后不完全的统计，在武汉共抄家21000户，抄出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圆26.7万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乱查抄、揪斗导致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那是恐怖的10天。长江航运公司工人出身的教师沙云乐回忆：“8月23日，长航党委书记贺崇升、政治部主任李震宇为首的当权派，发动了一个揪斗牛鬼蛇神运动，把长航系统内部揪出了32个人，带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在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游了一圈，武汉搞游斗牛鬼蛇神是长航带头搞起来的，对湖北的影响很大”。

截至月底，官办的红卫兵和多数派，极其热忱地投入了“破四旧”和在社会上横扫所谓“牛鬼蛇神”，也热中于在本单位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坏分子；而少数派，从传达11中全会、辩论前段运动方向、辩论《炮打司令部》、竞选单位文革委员会、迎接首批南下红卫兵，开始把批判矛头指向前段的运动，认为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思潮和文字的激荡与集聚过程里，产生了第一批少数派的战斗队，如湖北大学的“红八月公社”、武汉水院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水院书写致工作队公开信的三位同学，也就成为“横扫”队的组织人。他们的批判意向很明确、尖锐，在成立战斗组织时，也纷纷按照“16条”规定原则，向省委文革领导小组正式申报，争取省委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省文革领导小组（当时多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同志出面）开始也确实认真地接受了少数派成立组织的要求，以至举行授旗仪式；虽然省委领导对这些开始脱离传统权力的控制，完全靠少数派学生自己结社起来的战斗队，真可能忧心重重。

（未完待续）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2005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